

# 評 1957 年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大會

——以大會有關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關係的討論為中心

王美秀

---

[摘要] 通過考察 1957 年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大會上中國政府領導人和天主教中國神職界有關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聖座關係的正式講話和會議期間與會牧者的討論言論,可以發現,與會者把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聖座的關係理解、表述為政治、經濟、宗教三種關係,決議中國教會割斷與梵蒂岡的政治、經濟關係,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羅馬教宗”。與會者一致表示,教區選舉產生主教候選人後,名單要先行上報聖座,由教宗委任後再舉行祝聖。

[關鍵詞]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 中國天主教會獨立自辦 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 教宗委任後祝聖

[中圖分類號] B97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194-09

---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之初,名為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通過對比可以發現,不僅友愛會名稱今昔不同,而且該會成立時呈現出的一些特點,如今在理論上和部分實踐中均消失殆盡,這是顯而易見的。但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在一片喧囂、嘈雜和歌頌中,這一現象被各方面所忽視。而且,以往的中文學術研究對此幾乎未加關注。在研究天主教在當代中國的歷史、現狀和中國與聖座關係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對此做了初步研究。

本文意在使用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之初的文本,<sup>①</sup>重點考察友愛會成立大會上中國政府領導人和天主教中國神職界有關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聖座關係的正式講話和會議期間與會牧者的討論言論,從而發現 1957 年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大會是如何認識、理解、表述和界定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聖座關係的。

## 一、大會的文化、政治、宗教背景

20 世紀 50 年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之初,按照自己的執政理念對全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結構和組織進行了全面的改造與重構,以便鞏固政權,全面迅速地掌控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安全和國防架構,以及科研、文化、教育、醫療的控制權,讓社會各個階層、各領域的人民接納和順服新政權。這一時期,中國的宗教組織開展的革新活動,就是宗教組織在新政權的

引導下進行重構並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時被中國共產黨接納的過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成立,既是 20 世紀 50 年代中國政府宗教政策和思路的實施以及對中國宗教格局重新佈局、調整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政府對外政策、對外關係的一種明確表達。它不僅體現了中國政府對 50 年代冷戰時期的西方世界的理解,也反映了中國政府對自我代表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定位與認識。

眾所周知,中華文明有數千年的歷史,中華民族是個自豪的民族,擁有儒釋道深厚的宗教和文化傳統及豐富普遍的民間信仰。許多世紀以來,華夏民族以中國自居,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視周邊國家為朝貢國。19 世紀中葉以前,中華帝國的統治者一直享有萬邦來朝的美譽。然而,1840 年以後,西方列強打破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帝國理念,國家陷入四分五裂。西方列強通過條約促使大清帝國開放國門和商貿活動,割地、賠款,在許多沿海城市出現了不少享有治外法權的國中之國——租界,國家由此蒙羞,給中華民族留下的傷痛至今難忘。清朝滅亡後,戰亂綿延不絕。直至 1949 年 10 月,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充分表達了中國人基本實現國家統一、獨立、自主的自豪感。1949 年 8 月 18 日,毛澤東主席發表《別了,司徒雷登》,旨在向西方宣告即將成立的新政權對西方世界的立場,中華民族擺脫了西方的控制,將永不再受西方勢力包括外國傳教勢力的制約和影響,要做自己的主人。在 20 世紀 50 年代,東西方冷戰格局形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個新興的社會主義政權看來,毫無疑問,梵蒂岡聖座屬西方帝國主義陣營,與中國政府勢不兩立,由此中梵對抗之勢已不可逆轉。

在對待外國傳教士及其帶來的基督宗教方面,新興的中國政府斷定他們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及其先鋒。於是,開始驅逐外國傳教士,聖座駐“中華民國”大使黎培理因從事反共活動,被以摩納哥僑民的身份驅逐出大陸,後經香港轉至台北。至 50 年代末,只有美國瑪利諾會的華理柱主教 (James E. Walsh) 因被判刑而留在大陸,<sup>②</sup>其餘外國傳教士皆離開中國大陸,或返回本國,或轉至其他地方。

與此同時,針對留在大陸的天主教中國籍神職人員,各級黨和政府機構主要是統戰部開始組織他們開展政治學習,參加各種政治運動,接受改造和教育,學習周恩來等人與國內基督教、天主教人士的談話,瞭解共產黨對天主教、基督教的立場和政策。從基層縣、市、省三級,逐步動員基督教、天主教人士,與西方帝國主義宗教勢力割斷聯繫,全面開展三自革新運動,宣佈天主教會要在中國大陸實行自治、自養、自傳,於是天主教愛國會在各地紛紛成立。

這一時期,中國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教友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批判庇護十二世譴責中國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的通諭文件。<sup>③</sup>1956 年,全國各地的天主教愛國團體已多達 200 餘個。<sup>④</sup>同年初,參加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的天主教代表,在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主持的座談會上,提出成立中國天主教全國性愛國組織的建議。1956 年 7 月 19 日至 25 日,“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預備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發表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書》說明:“熱愛祖國、服從政府原是天主的誠命,吾主耶穌說‘愷撒的歸愷撒,天主的歸天主’,分明指示我們有愛祖國愛教會的神聖職責。聖伯多祿聖保祿宗徒以及歷代諸聖也曾教誨我們該如何服從政府。自古為祖國為正義犧牲的聖人們,如聖女貞德等,都得到了聖教會的崇高崇敬。這都確切證明,愛護祖國為每一個神長教友的本分,愛國愛教是分不開的。”該文件提出,“為了更進一步團結全國神長教友,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積極參加祖國建設與各項愛國運動,保衛世界和平,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們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愛國組織。”<sup>⑤</sup>顯而易見,這個文件為中國教友在未來處理愛國

與愛教的關係問題,確定了基調,並且表明政府認為成立全國性愛國組織的條件業已成熟。在全國自下而上醞釀成立天主教愛國會的同時,一些神職人員和教徒則因為對信仰和政治的不同認識而選擇不參與、不捲入政治運動的不合作立場,在家裡自行舉行彌撒或念經。這些活動成為後來出現的地下教會的萌芽。

## 二、大會的基本概況

自1949年至今,中國天主教會舉行過多次全國性代表大會,但1957年在北京舉行的愛國會成立大會持續時間之長,的確是獨一無二的。其中預備會議從6月17日至7月14日;正式會議從7月15日延續至8月2日。正如皮漱石總主教(聖名依納爵,瀋陽教區)在閉幕詞談及會議的內容時所言,“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經過27天預備會議,和19天的正式會議,學習了毛主席‘有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習仲勳秘書長的講話,總結了幾年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的成績和經驗,熱烈討論了兩條道路的問題,反帝愛國問題,中國天主教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宗教政策問題,以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等問題。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章程,推選了委員會委員,成立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會議期間,代表們充分發揚了民主,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根據‘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對許多錯誤思想和錯誤言論,進行了揭露和駁斥,開展了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從而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基本取得了一致的認識。”<sup>⑥</sup>當然,會議期間,除開會外,他們還有一些其他活動,如舉祭彌撒、去天壇公園等地參觀、接受國家領導人接見等。由此可見,與會者們被給予充裕的時間就有關問題和分歧進行充分的討論和辯論。

出席成立大會的天主教代表總人數為241人(請假4人,實到237人),其中主教11人、宗座總理4人、代理主教及副主教58人、神父84人、修士1人、修女9人、教友74人,他們代表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的100多個教區、300多萬教友。<sup>⑦</sup>

在這次持續近20天的成立大會上,最重要的內容是7月16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的講話和《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其次是李伯漁主教(聖名類思,周至教區)作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情況及今後任務》的報告。再則是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何成湘的簡短講話和王文成主教(聖名保祿,南充教區)宣讀的開幕詞、皮漱石總主教宣讀的閉幕詞。除此之外,是代表們的分組討論和就有關問題舉行的大會發言。會後次月發行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其中日誌部分刊登了每日的主要活動內容。從專輯內容和篇幅長度來看,分組討論是非常熱烈的。

值得補充的是,除習仲勳發表講話、朱德副主席接見全體代表外,會議期間衣著漂亮裙子的北京教友女童還被安排向大會獻花。會場上還設有中外記者席(照片顯示有四位記者就坐,其中之一是西方男記者)。這些安排都是後來的天主教代表大會所沒有的。

## 三、會上關於中國教會與梵蒂岡關係的議論

### 1. 習仲勳談中國教會與梵蒂岡的關係

習仲勳的講話包括5個部分:(1)關於兩條道路的問題;(2)關於反帝愛國問題;(3)關於宗教界肅反問題;(4)關於中國天主教與梵蒂岡的關係問題;(5)關於宗教問題和宗教政策問題。其中(1)至(3)主要談政治問題以及與宗教有關的政治問題,強調中國天主教會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作為中國的天主教人士必須愛國,“愛國愛教是統一的”,宗教不能超政

治、超國界，“愛國與愛教應該同時並重，而且在一定條件下，愛國應先於愛教”；批判信仰通訊社反對中國教徒加入愛國會，斷定梵蒂岡“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你們跟著梵蒂岡走是危險的”。“中國天主教的事情，要由中國教徒自己來辦”。“宗教界不僅有反革命，而且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是十分嚴重的”，肅反已經達到了“純潔宗教組織的目的”。<sup>⑧</sup>

習仲勳在談到中國天主教與梵蒂岡的關係問題時，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劃清政治關係，可以保持純宗教關係。他說，“到底中國天主教與梵蒂岡的關係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關係呢？一方面固然是宗教問題，但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關係到兩個根本對立的政治立場問題。這是由於梵蒂岡不僅在解放前就利用中國天主教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服務，而且在解放後對新中國，對社會主義制度採取敵視態度，以聖諭、神權煽動天主教會反對新中國，並力圖繼續利用它的影響把中國天主教會作為帝國主義反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工具。因此我國天主教會對梵蒂岡的態度，僅從宗教關係出發是不對的。這個問題，過去很多人分不清是非。必須堅決站穩中國人民的立場，劃清政治上的敵我界限，打破梵蒂岡假借宗教干涉我國內政的陰謀，與梵蒂岡徹底割斷政治上的一切聯繫。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不丟掉立場，不損害中國人民利益，而且有利於教會本身的純宗教聯繫。我們早已表示過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有宗教方面的聯繫是可以允許的。那麼是什麼原因阻礙了這種聯繫的正常運行呢？主要原因是梵蒂岡對新中國一向採取敵視態度，他們破壞了這種聯繫”。“在國際上，梵蒂岡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美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控制梵蒂岡，梵蒂岡為美國侵略集團服務。”<sup>⑨</sup>針對台灣問題，習仲勳在講話中澄清，“由於在政治上梵蒂岡沒有改變敵視新中國的態度，仍舊支持蔣介石集團，派黎培理繼續駐在台灣，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出新中國與梵蒂岡建立所謂‘邦交’，發生宗教聯繫，這不是承認兩個中國嗎？這能說是建立了一種合理的友好平等的宗教關係嗎？這是何等嚴重的錯誤。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不容許有兩個中國。因此，中國天主教會派代表團赴梵蒂岡和向梵蒂岡所謂‘致敬’電等想法，都是不對的。不這樣做就是愛國，也正是愛教。”<sup>⑩</sup>

習仲勳進一步說明，“必須指出，我們不能容許梵蒂岡利用中國天主教來進行其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陰謀。同樣，我們也不能容許教會藉口宗教上的聯繫，為梵蒂岡的政治陰謀服務。”“中國天主教必須徹底改變舊中國時代處在帝國主義、外國修會控制下的半殖民地狀態，堅決走反帝愛國的道路。”<sup>⑪</sup>

習仲勳清晰地要求中國教會，“你們不但要反對梵蒂岡企圖利用中國天主教作為破壞新中國的一切政治陰謀，而且要梵蒂岡尊重中國的主權，尊重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徒在宗教上應有的權利，不得任意干涉中國天主教的教務，對中國天主教主教的選擇、任免，也必須尊重中國天主教會的意見。”<sup>⑫</sup>

在中國教會與梵蒂岡以及其他國家天主教會的經濟關係方面，習仲勳要求“中國教會在經濟上必須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拒絕接受外資津貼。因為不管來自梵蒂岡的‘教務經費’，或是所謂捐獻，都不能保證帝國主義不會通過它來達到政治上控制中國天主教會的目的。這樣，我們才能使中國天主教真正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實現中國天主教真正由中國教徒自辦的目的。”<sup>⑬</sup>

他說，“總之，中國天主教會與教徒必須從六億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維護國家的獨立、尊嚴出發，保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站在愛國的立場上來考慮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的關係問題。在不違反中國人民利益、不侵害中國主權和梵蒂岡改變了敵視新中國政策的前提下，天主教才可以和梵蒂岡發生宗教事務上的關係，但這種關係是一種獨立自主的宗教關係，而不是梵蒂岡利用宗教干涉中

國的內政,侵犯中國主權的宗教關係。”<sup>⑭</sup>中國天主教徒群眾的反帝愛國運動“要解決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它的任務是要使中國天主教由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變為中國教徒自辦的宗教事業,所謂自辦,就是要與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劃清界限。”<sup>⑮</sup>

他斷言,梵蒂岡不讓中國教徒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就是為了使你們與政府對立,反對社會主義,這實際上也是干涉我國內政。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不受人欺侮,也不欺侮人,新中國的宗教也應該如此。中國天主教就是在中國,梵蒂岡沒有權利干涉,梵蒂岡對新中國是恨透了,中國天主教會到底怎麼辦,要從長計議,請你們自己商量。將來中國天主教與梵蒂岡的關係,是雙方談判,只要中國天主教能堅持真理,把教會辦好,再談判也就好辦了,……你們作為新中國的公民,要有民族自尊心,作為中國天主教的教徒,要有辦好中國天主教的自信心。……如果天主教徒離開了反帝愛國和社會主義,而去執行梵蒂岡反對新中國的政策,這是沒有前途的。”<sup>⑯</sup>

綜上所述,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在講話中,把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聖座的關係劃分為政治、經濟和宗教三種關係,提出中國教會必須結束過去由梵蒂岡和外國修會控制的狀態,由中國教會人士獨立自辦;必須割斷與梵蒂岡在政治、經濟上的聯繫;在中國神職人員獨立自辦的前提下,中國教會可以與梵蒂岡保持純宗教關係,同時,梵蒂岡要尊重中國教會關於主教人事的任免和選擇。習仲勳代表中央政府向與會代表發出的信息是清晰明確、不可辯駁和拒絕的,否則就“把天主教變成了中國人民前進中的累贅”,是“沒有前途的”。<sup>⑰</sup>放在 50 年代政治運動的背景下來看,這個警告是十分嚴厲的,結果證明是十分有效的。

## 2. 天主教神職界論中國教會與梵蒂岡聖座的關係

鑒於中國教會人士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分為體現集體意見的大會報告、決議和體現個人看法的分組討論和大會發言,以下分兩部分展開討論:(1)主要的致辭、報告和大會決議關於中國教會與聖座關係的陳述;(2)分組討論部分。

(1)如前文所述,大會上表達集體意見的教會文件主要有《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李伯漁主教作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情況及今後任務》的報告、王文成主教宣讀的開幕詞和皮漱石總主教宣讀的閉幕詞。

王文成主教在開幕詞裡表明,經過預備會議期間的學習和討論,與會者對於愛國愛教幾個基本問題達成共識。首先,在政治上,大家熱愛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其次,明確愛國愛教方向,反帝愛國天經地義。對於來自任何方面的以宗教形式出現而實質上是打擊愛國運動的政治命令和措施,必須堅決反對。<sup>⑱</sup>

李伯漁主教在《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情況和今後任務》報告中闡明,“愛國是公民的神聖職責。”“我們天主教友是人民一分子,愛國當然也義不容辭。況且,我們愛國,還有另外一重意義。因為國家是從天主來的,愛國又是天主誠命。……我們應當愛什麼樣的國家呢?根據我國憲法和聖教會精神,我們應當肯定地說,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sup>⑲</sup>教會雖是專務榮主救靈的超性組織,也是社會性的有形團體,要與社會各方面和好相處,有利於教務和其他工作的開展。

關於愛國會的性質這一敏感話題,李伯漁在報告中明確說明,“愛國會是我們天主教友愛國愛教的群眾團體,不是教會組織。因為這個團體的所有成員都是神長和教友,所以我們在宗教上應當保持聖而公教會的精神,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領導。但是,梵蒂岡在政治上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追隨美帝國主義,一貫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反對梵蒂岡利用宗教形式而進行的政治干涉和破壞陰謀,劃清政治和宗教的界限,堅決割斷與梵蒂岡在政治

上、經濟上的關係。”<sup>20</sup>由此可見，該報告把政治、經濟和教義教規區分得涇渭分明，這是非常明確的，而且強調了愛國會是“群眾組織”，“不是教會組織”，中國的天主教友“在宗教上應當保持聖而公教會的精神，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領導”。

皮漱石總主教在閉幕詞裡指出，通過代表會議，大家的收穫之一，就是“明確了中國天主教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大家認識到我們中國天主教應該保持聖而公教會精神，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羅馬教宗，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羅馬教廷一貫敵視新中國，利用中國天主教替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服務，利用宗教權力煽動中國天主教神長教友來反對自己的祖國，這是每一個愛國的神長教友所不能容忍的。……如果羅馬教廷對參加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神長教友加以無理‘絕罰’，我們認為這種‘絕罰’是反動的，非法的，無效的，堅決不能接受。”<sup>21</sup>

皮漱石表示，大會的另一個收穫是，“認識到中國天主教必須走獨立自主、由中國神長教友自辦的道路。通過討論，與會代表一致認識到，目前我們的國家是一個獨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舊中國帶給我們中國天主教會的被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的狀態，是與我們國家的獨立地位完全不相稱的。因此，大家批判了那些認為‘應無條件服從羅馬教廷’和聽命於被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的謬論。代表們一致指出：中國天主教必須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拒絕羅馬教廷的無理干涉，結束教會的殖民地狀態，在保持聖而公教會精神的原則下，獨立自主地辦好教會。……中國聖教會，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羅馬教宗，在宗教事務上，完全應該享有獨立自主的權利，這並不失去至一、至聖、至公的精神”。<sup>22</sup>

1957年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是天主教會在當代中國歷史變遷的一個劃時代事件。《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1957年8月2日通過）是此次會議與會者舉手表決通過的最重要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與會者的想法，也如實地體現了政府領導人對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普通信徒的要求。《決議》在中國教會要愛國愛教、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世界和平這些表述上，和其他文件並無二致。《決議》也駁斥了梵蒂岡破壞愛國會的言行。以下引用該文件的這段話最集中地表達了此次大會對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羅馬教廷關係的立場和主張：“會議一致認為，為了祖國的利益，為了教會的前途，中國天主教會必須徹底改變舊中國時代帝國主義帶給我們教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實行獨立自主，由中國神長教友自己來辦，在不違反祖國利益和獨立尊嚴的前提下同梵蒂岡教廷保持純宗教的關係，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但必須徹底割斷政治上、經濟上和梵蒂岡教廷的關係，堅決反對梵蒂岡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侵犯我國主權、破壞我們正義的反帝愛國運動的任何陰謀活動。”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在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聖座關係問題上，以上提及的報告、決議、開幕詞和閉幕詞所表達的想法，是一致的。

## （2）分組討論有關中國教會與梵蒂岡的關係

參加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大會的天主教與會者的討論發言主要分為4個主題：（a）關於兩條道路問題；（b）關於反帝愛國和肅反問題；（c）關於羅馬教廷無理剝奪上海教區合法權利和破壞我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問題；（d）關於中國天主教與羅馬教廷關係及獨立自辦問題。通過閱讀可以發現，參加討論的神長們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

一種比較溫和的意見主張，中國天主教神職人員在政治上、經濟上要與梵蒂岡割斷關係。在人

事方面,要獨立自主,要求梵蒂岡尊重中國教會的意見,但主教的選舉要按照教會法典辦事,選舉愛國愛教的中國神職人員做主教。

舉例來說,皮漱石總主教在討論中指出,“以往,由於中國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我們中國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也就處在被統治的地位,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權利,不用說當主教,就連個本堂,也必須是帝國主義分子允許才能當上,他們在中國做了多少不合理的事情! 全國一百多個教區,而中國的主教僅有二十幾位。現在我們中國站起來了,我們中國天主教會也應當站起來,不能再容忍帝國主義分子統治和壓迫我們中國神職人員及教友們啦! 我們要求梵蒂岡尊重我國的主權和中國天主教會的意見,關於主教的選舉任免問題必須遵照法典和通過協商的方法解決。也就是說,要由愛國愛教的中國人領導中國教會,我認為這是應當的,也是合理的”。<sup>②</sup>

又比如,天津李德培神父(後來自選自聖成為天津主教)在表述獨立自辦時認為,教宗是聖教會的元首,但現在中國已經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如果中國天主教會仍然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是與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不對稱的,也是全國三百萬教友和六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們必須改變教會的半殖民地狀態,就是說,今後我們一定要把中國的天主教會改變為中國人自辦的教會”。他繼續闡明,“所謂自辦,絕不意味著脫離教宗,成為裂教。我們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國神職人員管理中國的教會;在純屬宗教方面的事務上,我們依然要服從教宗的領導。”<sup>③</sup>“今後我們要循著獨立國家的例子,由地方神職人員內推選又愛國、又愛教、為人民服務的優秀候選人,呈報教宗,由教宗加委。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再派來帝國主義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給我們來當主教,我們絕對不接受。”

他也同樣堅持與教廷割斷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繫,只能在純宗教性的事情上服從教廷和教宗的領導。他認為,純宗教的事情包括,“第一,教宗以其在規定當信的道理時所有的不能錯的權力所宣佈的信條,我們必須遵守。這是聖教會的根本,是我們必須接受,也該當接受的。如1950年教宗宣佈聖母連肉身升天為當信的道理,不信這一端道理就不是天主教了。第二,教宗或教廷頒佈的有關聖事、禮儀方面的規定以及當守的規矩,我們必須接受。如近年來兩次關於聖體空心齋的規定,重訂聖主日禮儀,及其他屬純宗教性的事項等。”<sup>④</sup>

許多與會者在發言中表達了相似的看法,中國教會要與教廷保持純宗教關係,要堅持按照法典選舉愛國愛教的中國神父擔任主教,選舉後要向教宗申報,請求“加委”。有些人還提出,要求“教廷撤銷被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的主教名銜”,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友要下定決心,獨立自主地辦好教會。<sup>⑤</sup>

一種比較激進的意見,在中國教會切斷與梵蒂岡政治上、經濟上的聯繫,保持純宗教關係上與溫和意見是一致的。二者的區別是,激進主張堅持強調,中國教會人事上要獨立。中國教會選出主教候選人要“上報教宗,力求批准”。如果教宗不批准,那就是“別有用心”,“我們就應與他進行合理鬥爭,迫使他接受,不達目的決不罷休。”<sup>⑥</sup>

貴陽陳原才神父(1958年當選貴陽主教)在討論發言中說明,“一個獨立自主的教區,不僅在政治上不受梵蒂岡指使,在經濟上不接受梵蒂岡的津貼,就是在教務管理上,也不受梵蒂岡任意擺佈。”<sup>⑦</sup>他堅持,獨立自主教會的管理人應由中國神父選舉,“後報梵蒂岡加委”,梵蒂岡應該批准。但“梵蒂岡一向都在利用宗教形式來實現它打擊新中國的政治陰謀。因此,批與不批就是政治問題,就超越了它應有的權限,我們應把它當作政治問題對待,自求解決,不要理它。這樣我們對得起天主和教友的靈魂。”<sup>⑧</sup>認為教宗在不可錯的特權外,也是可能錯的,我們不必盲從,要放開腳步,辦

好教會。

內蒙古龐世宏神父表示,要把半殖民地的中國天主教會改為中國人自辦的獨立自主的教會,要求教廷在主教任免上尊重中國天主教會的意見。但這是一場複雜艱巨長期的鬥爭,主教候選人要報梵蒂岡批准,不批准就據理力爭,若只剩下一位主教,梵蒂岡還不批准,我們就自謀解決,就是一定要獨立自主把中國教會辦好。<sup>③</sup>

湖南省楊高堅、李震林、屈天賜等七位代表的聯合發言也表示,若梵蒂岡無理拒絕中國教會選出的主教候選人,“我們必須尋求自己解決主教的辦法”。煙臺宗懷謨主教大膽地表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要儘快祝聖中國主教,“為爭取聖中國主教而鬥爭!”<sup>④</sup>顯而易見,這種激進觀點成為翌年中國教會未經羅馬教宗委任,開啟自選自聖中國主教歷史的支持力量。

此外還有一種保守的觀點,以王文成、趙振聲、尉寶山、王克謙為代表。在籌備會議期間,他們提出,中國教會應無條件地服從羅馬教宗,愛教就是愛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要自願,成立愛國會要經梵蒂岡批准。很明顯,這種觀點是不能被接受的,在籌備會議期間就受到與會者的批評,這些人的看法後來發生改變,做了檢查。這種主張在正式會議期間就消失了。

## 結束語

20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的政治運動年年不斷,人們處在緊跟形勢和唯恐跟不上形勢的緊張氣氛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不知所措,積極參加政治學習而不得要領。全國性的鎮壓天主教“反動組織聖母軍”之後,國內天主教受到巨大震撼,人們開始逐步體會和認識到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無論是神職人員,還是普通信徒,面對歷史的巨大變革和新的政權,無論是否做好準備,都必須做出抉擇。起初,神職人員必須改變不參加生產勞動的舊習慣,要投入到生產勞動中,做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後來是必須參加地方統戰部組織的政治學習和政治活動,如抗美援朝遊行、三自革新反帝愛國運動的學習和思想檢討等。1955年,全國各地天主教會都在肅反運動中都揭發出一些反革命集團,如上海天主教會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和太原天主教會以郝乃[鼐]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批判和肅清天主教會內部反革命集團流毒的活動,此起彼伏。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國內天主教會內部也揪出一些右派分子。與這些運動相伴隨的是,全國各地成立天主教愛國組織以及天主教禮儀的簡化和改革運動。比如,不得在教堂裡為嬰兒進行洗禮;成年教徒不得在教堂舉行婚禮;農業生產旺季,教會不得組織農民集體朝聖,以免耽誤生產。這些政治運動和愛國主義教育、教會禮儀改革,使天主教神職人員和信徒意識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必須公開表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道路,與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起,走出一條愛國愛教、獨立自辦教會的道路,才是唯一出路。

有鑒於此,在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大會上,天主教的與會者們紛紛表達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和決心;在政治上、經濟上採取了與社會主義新政權相適應的路線和立場,割斷了與梵蒂岡的關係。在宗教問題上,力爭提出“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提出按照法典選舉中國教會的主教候選人,並且報教宗批准加以委任;提出仿效其他主權獨立並且已宣佈建立聖統制的國家,在中國結束半殖民地的教會歷史,實現由中國神職人員選出愛國愛教的主教管理中國教會的希望和權利。這些是大會的與會者們努力堅持和堅守的底線。然而,鑒於教宗是教會領袖和梵蒂岡元首的雙重身份,其通諭和教內處罰帶來的宗教與政治的難解難分,一直是與會者顧慮和討論的問題。他們力主分離其政治角色和宗教角色,但實際處理中依然困惑重重。



比較激進的觀點,似乎已經基本斷定羅馬不可能批准未來選出的主教候選人,表達了自行解決產生新主教的強烈願望,暗示出翌年自選自聖中國主教的可能性。

- ①本文主要資料出自《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28~29頁。該書由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編,1957年9月印刷,應該是教會內部出版物,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地點。該書收集了1957年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重要圖片、講話稿、會議決議、愛國會章程(第1~30頁),以及會議期間的眾多討論發言稿節錄(第34~144頁)、與會代表名單、會議選舉產生機構人員名單(第154~169頁)和會議簡要日誌(第170~174頁),是研究中國天主教當代發展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 ②美國天主教外方傳教會(即瑪利諾會)會士。1915年12月晉鐸。1918年末抵中國廣東省,1927年5月被祝聖為主教。1936年返美後擔任該會總會長。1948年再度來華,在上海出任天主教中華全國教務協進委員會秘書長。1958年10月18日在上海被捕,判處20年徒刑。1970年7月被提前釋放,是最後一位離境的西方傳教士。參見 Jean-Paul Wiest, *Maryknoll in China: A History, 1918-1955*,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
- ③這些文件包括(但非全部)1952年1月18日庇護十二世發表的《開端,我們切願聲明》和1954年10月7日頒佈的《致中華人民》通諭。
- ④①⑨②⑩參見李伯漁:《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情況和今後的任務》,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16~17頁。
- ⑤《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書》,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編:《聖神光照中國教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54頁。
- ⑥②⑪②皮漱石:《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開幕詞》,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28~29頁。
- ⑦《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代表教內身份統計》,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159頁。
-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參閱習仲勳:《國務院習仲勳秘書長在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根據講話錄音整理),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4~15頁。
- ⑰參閱王文成:《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開幕詞》,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2頁。
- ⑱皮漱石代表的發言,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124~125頁。
- ⑳㉑李德培代表的發言,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125~126頁。
- ㉒參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132~141頁。
- ㉓參見左維門代表的發言,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128頁。
- ㉔㉕陳原才代表的發言,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128~129頁。
- ㉖參見龐世宏代表的發言,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130頁。
- ㉗參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專輯》,第131、143頁。
- 作者簡介:王美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05

[責任編輯 陳志雄]